

多重视阈下的欧洲哲学史研究

——评高文新教授《欧洲哲学史研究》

韩志伟 杨乔乔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在当代中国,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方法进行哲学史研究?高文新教授的《欧洲哲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一书面对中国哲学发展的独特需求,通过对众多哲学系统的比较,选择了在发展进程、发展形态以及形态分化都属于人类哲学中最典型形态的欧洲哲学作为研究的样本,意图在对欧洲哲学的深入研究中,吸收其理论成果,建设中国自己的民族文化。高文新教授认为,想要理解某一具体的哲学理论,首先要反思这种哲学理论产生的历史原因;想要具备哲学理论研究的扎实功底,必须弄清楚哲学史的发展逻辑,掌握哲学家思想推进的真实内容。我们在进行哲学史研究时,应当以“前进的逻辑必然性”为指导,这样才能在面对浩瀚的哲学史材料时,抓住重点,写出特点,而不是简单的哲学思想的罗列。因此,《欧洲哲学史研究》一书从认识史、文化史和中西方比较史三重视阈,将“前进的逻辑必然性”理论原则融入其哲学史的研究进程中,从认识史的角度论证了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从文化史的角度阐释了文化与哲学的内在联系,从中西方比较史的角度说明了欧洲哲学的优势所在,为中国哲学自身发展提供思想借鉴。

一、认识史视阈下的欧洲哲学史研究

高文新教授在欧洲哲学史研究过程中,不同于以往哲学史家按照时间顺序划分哲学史的方式,选择了从认识史的发展层次把欧洲哲学史划分为4个阶段:(1)对存在规定性的追求阶段;(2)对主体认识能力的探索阶段;(3)对思维与存在统一性的研究阶段;(4)主客体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阶段。

在对存在规定性的追求阶段,哲学追问集中在“万物的本原是什么”,分为原始意识阶段与古代哲学阶段。原始意识时期,精神与物质的分化意识尚未建立,感觉的直接性与思维的间接性没能得到具体的区分,哲学认识表现为一种素朴实在论。人的认识注意力完全被客体所吸引,在对客体的追问中,形成对世界的本原是“水”“火”等特殊物质的理解。这种对本原问题的探索逐渐表现出一种从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趋势,开始对感觉与思维进行不自觉的区分,促进主体意识的形成与觉醒,进入到古代哲学阶段。自“人是万物的尺度”提出之后,哲学的研究从不自觉的客体意识开始发展到反思的主体意识。古代哲学突破具体表象的局限,把世界本原抽象为形上的理念。但是由于研究对象依旧是客体世界,古代哲学的抽象范畴只是作为存在的规定性意义出现的,而不是思维的规定。随着近代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ZX12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3JJD720009)。

作者简介:韩志伟,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杨乔乔,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专业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科学的发展，近代哲学的研究方向从对世界本原的追问转向对人自身认识能力的探索，主体意识以知性的思维方式分裂为经验论与唯理论两个阵营。经验论强调认识的感性来源，认为感性经验对认识起决定作用，思维作为把握对象的实质只是表现对象，而不使认识发生质变。唯理论明确表达了主体意识，认识到“思维着的自我”的主体能动性。但是，由于它想要使认识的起点脱离感性经验，导致认识完全成为一种理性推演的逻辑过程，陷入了不可知论。唯理论表面上看是在强调思维的作用，实质上同经验论一样，不懂得思维的能动作用是什么。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对客观对象的认识都是被动的，认为主观必须服从客观，没有真正理解主体意识的能动性。

直到康德的“自我意识”的提出，思维作为具有自身规定性的能动作用才得到反思。康德提出感性不仅是外物在人思维中的映像，还是经过人的意识加工过的主观意识现象，知性在此基础上，对感性表象进行思维。同时，不同于古代哲学在存在的规定意义上抽象出概念范畴，康德在对思维的规定的意义上对范畴进行重建。但是，由于康德认为客体的自在性是不可知的，这就使主体的规定性与客体之间如何相融成为问题。德国古典哲学在继承了康德的认识论范畴的基础上，对思维与存在如何统一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黑格尔克服了康德哲学非此即彼的知性思维方式，用辩证的方式去克服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将思维与存在统一在绝对精神之中，在绝对精神中实现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黑格尔在继承近代哲学重返古希腊辩证法的过程中虽然使辩证法走向了绝对唯心主义，但是却为马克思超越黑格尔实现主客体辩证的、历史的统一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整个哲学认识对象从客体——主体——主客体统一的发展模式，在哲学史的每一个发展环节都在规律性地重复。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说的“具体——抽象——具体”认识过程，不仅是人们认识某一事物要经历的过程，也是人类个体认识发展的过程，而且是整个人类认识史所经历的过程。^① 高文新教授这种把哲学史当作认识史的梳理方式更加清晰地让人们了解哲学内在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性。

二、文化史视阈下的欧洲哲学史研究

哲学作为文化的基因，是从宗教文化中脱胎出来逐渐发展形成的，哲学与宗教的关系表现为从“不自觉地分离”到“同一”再到“自觉地分离”的发展过程，欧洲文化也因此经历了从理性主义文化——信仰主义文化——理性主义文化的转换过程。

古希腊时期，欧洲文化以哲学为内核，宗教生成哲学思考的主要问题，哲学带动宗教自身的发展。哲学与宗教最初的分离是不自觉的，所以在早期哲学中依旧可以发现宗教的影子。在主体意识觉醒以后，宗教从原始自然崇拜发展为把具体事物人格化的多神教。多神教的宗教神话中孕育的哲学思维方式和问题，如正义、善、恶等观念，也促进伦理政治等社会哲学思想的发展。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对客体的理解进一步抽象化之后，宗教也随之从多神论向一神教发展。

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异化加剧，道德伦理问题突出，整个世界被消极笼罩，关于客观真理的哲学无法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哲学不再是引导着少数一些大无畏的真理追求者们前进的火炬；它毋宁是跟随着生存斗争的后面在收拾病弱与伤残的一辆救护车”^②。人在现世中找不到灵魂解脱的出路，于是在宗教领域里，通往幸福天堂的大门打开了。因此，中世纪的文化内核从哲学转变为宗教，哲学成为宗教发展自身的工具。中世纪基督教最初派别林立、体系混乱，神学家吸收古希腊哲学，把上帝理解为理念的精神实体，使“上帝”成为无形体的纯精神，解决了“神的统一性”问题。这一时期的哲学失去了自由生长的能力，失去了创造力，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随着宗教神学在中世纪的极端发展，宗教完全脱离人的本质，扼杀人性，理性与信仰的矛盾逐渐被意识到，促使哲学家们从根本上认

① 高文新《欧洲哲学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8页。

②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91页。

识到神学与哲学的不同。正是在对宗教神学本质的彻底理解上，哲学才能够在“自觉的”层面上真正地与宗教相分离。人文主义运动与宗教改革运动使人的目光回到对现世幸福的追求上，提倡人的自然理性，理性主义文化挣脱信仰文化的束缚得以复兴。在这一维度上，近代哲学与近代科学相结合，在对主体认识能力的探索中，恢复了人的主体性地位。

三、中西方比较史视阈下的欧洲哲学史研究

高文新教授在对欧洲哲学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研究中，始终把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作为比较的对象。中国哲学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但是如果用认识史的态度去研究中国哲学史，会发现中国古代哲学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高文新教授正是在这种比较视阈中，反思中国哲学在历史发展中的局限性，为中国哲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与方法论借鉴。

中国哲学与欧洲哲学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思想开端、发展形态以及求知态度上。欧洲哲学的发育是循序渐进的，逐渐深入物质内部结构，从具体意识向抽象思维过度，而中国的哲学却不可思议地以早熟的形态出现。在欧洲古希腊哲学思考世界的本原是“水”还是“火”等物质元素时，中国哲学就提出了“乾坤”“阴阳”等抽象的哲学范畴。这种早熟的状态并没有给中国哲学的发展带来优势，原因在于中国与欧洲哲学的发展采取了不同的形态。欧洲哲学发展层次分明地分为几个阶段，派别差异大，后人哲学是对前人哲学的批判性继承，在批判中否定旧有思想，创立新的思想理论，以“理性”为原则，在追求真理的热情下对欧洲哲学不断进行变革。中国哲学自春秋时期之后，发展就处于停滞的状态，后人的哲学是在对前人哲学的继承中建立的，后人为前人做论证，引经据典，千人一面。这一现象与中国的社会制度是分不开的，古代中国以血缘为纽带，是父权家长制政体，社会结构决定中国文化是“伦理型”文化，在师承关系中，“伦理”是最原则，后人的思想不可以对古人的思想“不敬”，只能是对古人思想的不完全理解。欧洲社会等级不是依靠血缘划分的，社会制度也不是靠道德维系，而是以力量和智慧维系。因此，欧洲哲学在求知的态度上，表现为“外向求真”，追问世界的本原，追求真理与科学。中国哲学在求知态度上表现为“内向求善”，精神追求的内容是忠孝仁义，在追问自身以外的世界时，往往也是回到自己的内心之中。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以前，不注重求知的文化并没有显现出自身文化的劣势。当近代实验科学在西方迅速发展以后，近代科学作为西方哲学思维的源泉使欧洲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差距一目了然。欧洲哲学在对客体追问到对主体意识能力的探索再到主客体统一何以可能的研究中，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符合认识从感性的具体——抽象——理性的具体的发展过程。中国哲学应当借鉴欧洲哲学，学习欧洲哲学的求知态度，实现当代中国实事求是哲学的系统性研究。

《欧洲哲学史研究》一书写于1994年，直至2015年才定稿，原因在于高文新教授想让书中的认识更精确，尽力能够在学术意义上为从事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研究的人们提供更具有启发性的认识。所以，先生的哲学史研究既系统性地展示了欧洲哲学发展的全貌，又创新地在三种视阈的结合下，对哲学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把握。从认识史的角度，讲清了哲学的“前进的逻辑必然性”，表达了对当代中国完善系统性实事求是哲学的需求；从文化史角度，考察了哲学史发展与文化的关系，提出了建立中国特色民族性哲学的需要；从中西方哲学史比较研究的角度，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哲学应放开视野，创新发展先进性哲学的期待。

责任编辑：马 妮